源於奧運

李漢源

疫苗、體育再啟動

近日，香港電視台人事變動換班子，綜藝節目換負責人，由「獎門人」曾志偉接任，新人事新作風，相信綜藝節目組必定會有大改革，比過往有所改良，志偉是一個喜歡體育的人，希望他負責後的綜藝節目組，可以如我最大的期望，多播一些體育節目吧！因為四五個月後便已經是東京奧運開幕，如果現時可以馬上購買版權，香港觀眾市民屆時便可以親眼見證香港運動員在奧運的表現以及勇奪獎牌的一刻。這樣除了可以滿足觀眾之外，更能將電視台的形象提高，用體育加強市民的凝聚力、歸屬感，一掃疫情陰霾的籠罩。

想我仍為電視台員工時，曾經與曾志偉多次合作世界盃，他喜歡足球，曾是青年軍球員，對體育有一定的認識；再加上他反應快，創意多，每次跟他合作都非常安心，因為有他在，一定對節目有正面的影響。電視台的新班底，就讓香港市民期待一下有新創意的節目吧，當然希望能包括體育節目啦！

全球已經經歷了足足一年的疫情肆虐，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疫苗開始面世，通常疫苗需要研發三四年才可以供公眾應用，今次新冠肺炎「特事特辦」，新冠肺炎疫苗一方面進行臨床試驗，另一方面則申請緊急上市使用，日前疫苗也運到香港，並已開始接種。香港也是跟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主要考慮優先為高風險群組接種疫苗，例如醫療人員、長者、安老院舍行業等等，但暫時運動員不在優先接種名單之內。我們當然能夠明白，各行各業也需要接種，而我們從事體育工作，則希望運動員能早日接種，早日投入訓練，迎接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

目前距離東京奧運還有5個月的時間，如果在這段時間內推廣接種疫苗的地區，疫情能夠受控，大大降低了病毒傳播的風險的話，這樣東京奧運就可以如期舉行。雖然現在這個時期疫情的嚴重性，比起奧委會一年前3月24日宣布東京奧運延期的時候或許還要厲害，但我們有一年經驗在疫情中生活，加上疫苗已經面世，相信各方面，不論是場地也好、主辦國也好，或參賽國的所有隊伍也好，都已經想好如何去配合各方，在疫情仍肆虐下安全地到場參賽。

當然我們或者運動員，還是有很多憂慮，雖然在疫情爆發時所有體育活動也停頓，但目前很多體育，因應有條件或規範空場已經恢復，歐洲五大足球聯賽、NBA、澳洲網球、美式足球超級碗等等，一些運動員稱接種疫苗後可能會對狀態有影響，因此必須接受接種疫苗的風險，但4年一次的奧運會如果未能如期舉行，對他們的損失或許更大，試問一個運動員的全盛時期橫跨多少個4年呢？

現今全球體育賽事已經進入變革狀態，尋找方法與疫情共存中，所謂適者生存，大家努力共勉之。

方寸不亂

方芳

優先有序

科興疫苗接種開始，有資格優先接種的朋友，半夜三更長時間上網預約，都不成功，等到火滾，抱怨可以理解。政府一早宣傳「護人護己」，呼籲市民早日接種，但政府工作不細緻，預約第一天就網絡塞爆了。

接種疫苗是新鮮事，第一天有「甩漏」可以理解，希望政府早日補漏，解市民之急。英國朋友說，當地為55歲以上居民接種，都是細分為九組的，最早優先接種的一組，是最高危的年齡層，有先後緩急之分，優先也有序。

我們香港接種疫苗的年齡層，60歲以上才有資格優先接種，長者多有慢性病同行，選擇傳統技術的滅活疫苗較穩陣。雖然60歲以上是「高危群組」，但高處未算高，沒有最高危，只有更高危。

政府安排五個組別人士優先接種，第一是醫療機構及參與抗疫的工作人員；其次是以年齡為界，60歲或以上人士，而70歲或以上長者可有最多兩名陪同者一起接種；第三是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和員工；第四個組別是維持必要公共服務前線人員；第五個組別是跨境運輸、口岸、港口工作人員。

政府這樣的「分組優先」，是全社會考慮，並非單純以年齡為區分。在抗疫第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危中之危，優先順理成章；安老院舍院友員工、公共服務最前線和跨境人員，每天都面對感染危機。

至於60歲以上長者，從健康與免疫能力來說，當屬高危群，但沒有社會工作，又沒有太多社交應酬，只是行山、打球、散步……染病機率其實不太高，大可不必心急接種。我們用勤於清潔、自我保護的方法，熬過了抗疫的一年，如今也不急於一時，先讓最前線的高危群組優先接種了，社會安全了，大家也相對安全。優先有序，輪到自己，就當仁不讓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讀《人在天涯——南渡》

面對一年多的疫情，讀書是一種最佳的生活方式，最近讀了幾本好書，其中一本是《人在天涯——南渡》，作者徐子雲，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笑容親切的學者，面帶三分稚氣七分真誠的大男孩。沒想到他寫出一本大時代的縮影，足見陽光燦爛的笑容背後，有一段淬煉的人生經歷。

當然，每一部小說的主角都潛藏着作者的原形，包括作者熟悉的親朋好友的身影。

1973-2003年，光是看這一段年份，就知道作者想表達國家在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時期，國門重新啟動後的30年所發生的人與事。作者既不在內地，又似在內地（18歲來香港，有內地成長的經歷，40年在香港，足以近距離觀察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作者40年來，「人在香港，心在祖國」。筆者認為，香港之所以迷人，甚至令人迷戀，是因香港地緣政治之故，既不在內地，又似在內地；作者近40年生活在太平洋的裙裾邊上（指香港）天天北望神州大陸，關心內地發生的每一件事。

作者徐子雲引用英國歷史學家Taylor（卡萊爾）名言：「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徐子雲表示：「文學比歷史更真實，歷史的年代、人名、地點是真的，內容大都是為勝利者寫的；而文學則恰恰相反，人名、地點是假的，其他的，大都是真的。」文學反映一個時代的本質是千真萬確的，但歷史求真，文學求美，也是事實；故此在中國三千年文化中，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那就是「文史不分家」，即文學和歷史學是分不開的，文學中有歷史學，歷史學中也有文學。

●作者是文學系教授！ 作者供圖

徐子雲觀察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甚少有這方面為主題的小說。例如，40年前深圳原為一個客家農村小鎮，如今轉型為高科技城市，匯聚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徐子雲說，改革開放初期是鄉鎮企業，人人「摸着石頭過河」，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到了後期則是知識分子、海歸派創業。

《人在天涯——南渡》書中反映這一段改革開放大時代歷程。透過書中幾位主角，鄺帥、余天海、唐明，三線發展的故事，具有警世、勵志的作用。書中對鄺帥着墨不多，但可塑性甚強，正直能幹的紅色江山接班人，肩負國家發展的重大使命。

吳旷教授認為，徐子雲的《人在天涯——南渡》着力於文學經營與存照，反映文學比歷史更真實，讀者掩卷之餘，想必有這般領會。作家楊明認為，本書有中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過程裏的波濤起伏，有人性純善與貪婪的矛盾糾結，為一個時代留下值得深思的印記。

據悉，《人在天涯——南渡》是上集，筆者文內提出。作者將故事情節分三線發展，留下鄺帥一線有極大發展空間，我們期待續集盡快出版，以饗讀者。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千奇百怪的口罩

不同媒體不止一次報道過，有色口罩藏有致癌風險，尤其是黑色那一款，其色愈黑，其毒愈深，可是不知是否致癌訊息多到令人麻木，即如吸煙有害，還是有人吸煙一樣，無視衞生的勇士還是無所懼畏，每日出街，迎面看到的口罩，雪白淺綠的，竟然一次少過一次，雜色口罩則一次多過一次，其中還摻雜罩不成罩的豬嘴鴨嘴甚至喇叭花灑般奇形怪狀的東西，只要能掩住鼻口的，都紛紛像參加創作大賽似的，施施然昂昂然戴出來亮相，能否防疫也不曾聽說有專家研究過。

花口罩看出有來自工廠，也有是家庭主婦自作聰明的手製品，其中有些還可能是改裝自舊衣物，布絨綢緞厚薄不等，總之百「花」齊放，圖案也怪到無奇不有，紅花部位東一抹西一抹，遠看像是滿臉鮮血；灰花圖案橫七豎八，活像主人忘記晨早不曾洗臉；淡黃暗綠點交錯的看似滿臉膿瘡，既無美術觀感，又無防疫意識，完全忘記本來用途，若非視口罩為潮流飾物，便顯然為了貪靚不要命。

黑到閃光的口罩，平滑無摺，本來就不通風，如何疏氣，以英雄人物姿態戴出來示人的黃毛小子以及疑似幫派的大佬不論，電視上看到白宮一眾此類應屬高級所謂「知識分子」的大小官員，也無知到一時除下攝入褲袋，一時掏出歪斜戴上，上既懵焉，下必甚焉，終於明白他們的確診數字何以日日飆升了。

時除時戴，已是一般長者的習慣，口罩褪離鼻子的也有，公園內尤其多見，可是疫菌無孔不入，認口兼認鼻，怎可掉以輕心？

本來以為小朋友怕束縛未必肯戴口罩，原來不然，因為小人兒看到大人戴了，想學大人，戴上口罩，走路時反而開心到跳蹦蹦，倒是看過食肆裏有個除下口罩的母親狂吻她襁褓中嬰兒，才真的令人驚心動魄，不是曾有6個月大嬰兒感染確診的新聞嗎？

●德國老漢，反對防疫戴口罩。 作者供圖

百家廊

若荷

又見花街

花街其實並不叫花街，這裏賣花，又是養花人家最多，因此被人稱作「花街」。四季更迭的時節，別的地方茂盛的是樹，而這裏卻大多是花，一叢叢自牆裏探出牆外。新年裏，這裏就擺滿了鮮花，在那樣的年月，花也是很稀罕的了。有月季，長壽花，還有南山腳上常見的杜鵑花。杜鵑花掛蕾，青黃像幾片初生的葉，及至搬到室內，蕾尖方吐出一點點紅色，愈吐愈大，終於風車狀綻開。花是單瓣，有玫色，也有粉紅和白色，品種較為單一。

那時的花價格便宜，沒有現在暖房裏的枝茂葉密，不成規模，都是喜歡養花的人家隨性而蒔，需要時才賣幾棵換錢花。花株種在泥瓦盆裏，或將根包在泥疙瘩裏，主人抱了去擺在街上路邊。新年裏，總有富裕的人喜歡。但那時的花，它裝飾的是庭院而不是房間。買花人並不期望它們在新年裏開花，而是盼着春暖花開的時候成活，經風沐雨，開出一院子春色。

花街有百十米見方，東、西兩邊是兩個小巷，北面可以深入村子，南面是河，鄰着一座拱形小橋，連接由北向南的要道。春天裏，楊柳在水裏彎成倒影，野鴨在水面弄着清波，沿街居住的人家門前綠竹掩映，杏花、桃花粉粉白白地開放。花街還是個集市。年節裏，賣得最多的是年畫，還有家家必備的煙花。

沿途都是高高的老牆，牆上開個門窗就是一戶人家。老牆以青石砌就，石與石之間有明顯的接縫，趕集人把一排鐵釬插進縫裏，繫一塊席大的藍印花布，再用別針別上一朵朵粉粉紅紅的絹花，頗得女孩的青睞。曾經對鞭炮製作很感興趣，拿來炸裂的碎屑研究。姥姥家的村子裏就有專門製作鞭炮的人家，我曾在二舅家看到過製作鞭筒的工具，乍看像一把袖珍的犁頭。上紀世八十年代風靡過自製煙捲的土機器，自切煙絲，買來成品煙紙自己加工，按照添料加工的步驟，一推一拉一支煙就加工出來，鞭筒製作的原理與此基本相同。

在所有的煙花中，「滴滴筋」是小孩子們的最愛，三五歲的孩子都可以獨自扯着一根兩根放着玩。它紙芯長六七吋有餘，二十幾根紮成一束，再一束束湊成一把，整齊地放在紙盒子裏，拴上繩索掛在胸前叫賣。因為「滴滴筋」的火藥容易漏出，賣滴滴筋的人大都手黑，臉也不白，眼角皺紋的褶子裏都是嗆進去的黑灰。我的表姐夫就曾到花街的集市上賣煙花，他形容他的鞭炮響聲有力，形容的字眼很粗俗，卻也非常恰當逗人，往往吸引很多人搶購。

值得炫耀的是花街裏有一個書店，三四間屋子的樣子，一半出售書籍，一半出售年畫和對聯，油印出來的年畫在陽光下散發出油墨的香。不售年畫的時候，櫃枱上擺放的是農技、電工、果樹等等的宣傳冊。時間再推進一些，掛曆也出現在書店裏了。每當去買書時，都有一位女店員埋頭在讀小說。女店員長髮及腰，髮質黑而油亮，編起的麻花辮每一股都十分飽滿。曾暗暗目測過她的髮長，希望那油亮的髮辮有一天會輕蕩在我的背上。書架上的書不是書脊朝外，立式擺放在書架上，而是書面朝天，一眼就能看到書封。花街不大，讀書的人卻真不少，不逢集，也不是年會的時候，有時好幾人同時站在櫃枱前，認真瀏覽展開在櫃枱和擺放在書架上的新書，他們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兒。我很為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個書店而驕傲而炫耀。沒有網絡和電器的時代，人們太需要紙質書的精神滋養了，只要你有足夠的零錢，有足以看懂所購書本的文化程度，所有新出版的文學書書籍都來者不拒。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個春節，我穿了一身嶄新的襖褲，棉襖口袋裏有幾塊錢的壓歲錢。我把往日積攢的錢與這壓歲錢合併在一起，但我並不打算買小人書，而是買高爾基的《我的大學》、《童年》，還有劉蘭芳的長篇評書《楊家將》，凡是出現在這個書店裏的所有的新出版的小說，幾乎都是暢銷書。當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演播時，書店裏的紙質書就一售而空。

逢過年集，買年畫和對聯的擠滿小屋。有牽着孩子的家長，有翹着腳探着身子遞錢取年畫的壯年漢子。集市上的年畫雖多，但是書店裏總有一些與時俱進的變化。隨着印刷技術的提高，年畫的色彩愈來愈鮮亮，畫面愈來愈栩栩如生，內容也由最初的山水演化為電影劇照，從《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杜鵑山》到《紅樓夢》中的系列人物，花街上的年畫引領着當地同行業的潮流。1980年的那個春節，我將四簾十二幅《鵲橋仙》年畫掛在床前，舉手投足猶如劇情再現。冥冥中彷彿聽見有人對語：「小姐，你看那裏的鳳仙花開了。」……那是蘇小妹和她的丫頭從畫中凌步而出來了嗎？參加工作後，母親將我臨摹了好幾個月的金陵十二釵鉛筆畫送了人，舊牆粉刷，張貼在牆上的所有發黃泛舊的年畫已蕩然無存。

●鳥語花香春光好。 新華社

不知什麼時候，花街再也沒有了花賣，它破舊了，沿街的高牆在長大了的我面前變得低矮，探向花街的不再是木欞的窗戶，而是有人在牆上扒個門，鑲上水晶玻璃，焊個鐵柵欄，美食館、五金店、裝飾材料部，還有自行車修理舖，一個個小商舖不溫不火地開張。有次去花街，故意問附近居住的年輕人：「知道這裏的花街嗎？」年輕人搖頭。剛剛焐熱了的雙手突然變得好冷。40多年過去了，花街變了，沒有花也沒有了書店和年畫。花街南面有個新拓出的集市場，逢集時，貨物擺滿在水泥條案上。時移世易，集市仍然熱鬧，只是沒有了河邊橋下的清澈水流，掩映農舍的綠竹，也沒有了藍印花布點綴老牆上的紅粉絹花。

聽說，當地有人願意出資再建花街，讓它回歸當年的小橋流水、江南水鄉的模樣，如消息準確，那真的不錯。只是我心中的那個花街，它還會回來嗎？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響，3月的春帷不揭……我懷戀的，是童年的一條小街，而詩人懷戀的，是哪個蓮一般的女子呢？望着滿目生銹的柵欄、櫥窗，我欣然的同時也很悵然。然而我相信，只要把它託付給一個有心之人，花街的繁榮，花街的美，一定還會重現。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正本清源

去年春節，香港在經歷了「黑暴」恐嚇之後，又突然遭遇病毒威脅。當時我有感而發，在這裏寫下《回家之路》，但重點講的「黑暴」造成的心理恐怖和餘悸令人擔心今後能否「順利回家」和「安心在家」。

一年過去，經歷了雙重肆虐的港人終於走了過來，隨着疫苗的到來，以及中央政府一系列撥亂反正的利民政策出台，明媚的春天也隨即而來。老天爺更恍如有預知能力，今年的春節前後，天氣比往年好，陽光普照大地，令壓抑了一年多的人們，心情也如晴空般，開朗起來。

記得去年我寫道：「香港不是一個脆弱的城市，今日中國人也不再是『東亞病夫』，看武漢火神山醫院十天建成，以及國人團結抗疫並互相激勵、關懷的行動，我相信，疫情很快會受到控制，滿目瘡痍的香港也終會浴火重生。回家之路，會是一條灑滿金色的陽光大道。」

現在回頭看，我這些天出門，真的感覺走上了一條「灑滿金色的陽光大道」。令我感到最大的欣慰是，自己的「正能量」得到感應：武漢疫情真的很快受到控制，香港疫情雖仍反覆，但作為開放和自由的國際化都會，雖歷經劫難，幸有國家這個強大的後盾，助我們恢復元氣。

經歷了兩場可稱得上是百年一遇的威脅及其造成的動盪和危機之後，香港和香港人難免有變，也必須變，更需要藉此做一些正本清源的事。去年年中出台的香港國安法是其一，不但協助特區政府解決了回歸後懸而未決的國安立法問題，彌補維護國家安全長期存在的法律漏洞，更及時遏制了蠢蠢欲動的「黑暴行動」，令香港的社會秩序和市民生活逐漸回到正軌。

本周初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出席「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專題研討會中的講話不但為促進香港整頓、改革帶來清晰、明確的信息和方向，也對治港者提出了體現其真愛國的三點標準。

其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就是天經地義，且不用提當年鄧公談回歸講話已說得很清楚，哪怕從常識理解，也無可爭辯。問題是過去十年，有人刻意以各種藉口，扭曲「一國兩制」設計原意，並妖魔化「愛國者」乃至國人，給青少年帶來錯誤價值觀，演變至前年極端的摧毀家園、自毀前途的悲劇。

今天確實是到了在行動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琴台客聚

伍呆呆

那些年，我為豌豆流過的淚

冬末時在菜地的各個角落裏撒下了一些豌豆種子。

開春後，隨着天氣愈來愈暖和，豌豆們迅速地發了芽，每天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瘋長了起來，還沒來得及吃上兩茬豆苗，藤蔓就已經裊裊婷婷地長到了一米多高，纏到了給它們搭的架子上，一天不下地去看，又已經渾身掛滿了晶瑩剔透的小白花，散發着淡淡的花香。再一天沒有去看，嬌嫩的小豆角便碧綠油亮地從稍有些枯萎的花心裏冒了出來，微風拂過時，豆角們在陽光下微微地顫抖着，像是都在樂不可支地笑。

種了許多年的花草和蔬菜，這卻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園子裏種豌豆。大抵是因為豌豆留在我的記憶裏的片段多是不愉快的。

幼時我和弟弟一起隨母親在鄉下生活了一段時間。我們的住所離別的村民家很遠，周圍除了一個大水庫便是無數的水稻田，母親擔心年幼的我們的安全，去生產隊上工之前總要囑我帶好弟弟，不要到處亂跑。然而孩子們總是坐不住的，等母親出了門，我便帶着弟弟到後山去玩。後山其實就是個矮矮的小山坡，對於當時僅兩三歲的弟弟和四五歲的我來說，邁着小短腿，幾分鐘就能爬上山頂。

春天，漫山都是傻綠傻綠的小麥苗，還有每天都在瘋長，每天都能看得到變化的豌豆苗。我和弟弟每天樂此不疲地爬上山，就是為了看豌豆苗一天天地長大，看它們開花，看豆角一個個地從花心裏冒出來，一點點地長大。雖然母親告誡過我們，生產隊的豆角是不能摘來吃的，但是飢餓和新鮮食物的誘惑還是讓年幼的我在忍了又忍之後，還是忍不住摘了兩隻豆角，一隻給弟弟，一隻自己迫不及待地放進嘴裏品嚐那帶着青澀的卻又鮮甜的味道。結果豆角在嘴裏還未咀嚼兩口，一個大巴掌就落到我的臉上，青綠的豆角汁混着紅色的鮮血從我的嘴角流了出來，一起流下來的還有滿臉驚嚇和委屈的眼淚。那一巴掌是路過豌豆地的村民打的。

後來豌豆成熟了，生產隊給每家每戶都分了一些，母親再去上工的時候，就給我和弟弟一人抓一把鹽水煮的豌豆，把大門鎖上，讓我們坐在院子裏吃。豌豆吃完了很久，母親還沒有放工，飢餓的我們忍了又忍，忍不住就派了體形較小的弟弟從門縫裏鑽進去再拿一些豌豆出來吃。結果弟弟因為身體小，腦袋卻比較大，往屋裏鑽的時候在門縫裏卡了半天。好不容易爬進去了，抓了豌豆從門縫裏遞給我，姐弟倆便隔着大門，一面吃一面哭，一面哭又一面吃。然而豌豆的體積有限，數量有限，再吃，肚子還是餓的。我自未成年便知道珍惜食物，節約糧食，大抵就是因為幼時曾為豌豆流過的那些淚。

近日看到許多報道，因為疫情的發展，全球的糧食開始出現減產，糧食的緊缺愈發地嚴重。而沒有經歷過糧食危機的人，大抵是不會理解為什麼當年一個成年人會因為一隻豌豆角去打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再讀曹植的《七步詩》，看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時候，會換個角度再看，當某一天我們再度面臨飢餓時，還有豆子可以吃，可以「煮豆燃豆萁」，也算是一種幸運了。